

历史 的 荣耀

历史研习社

编著

THE
GLORY
of
ANCIENT
CHINA

中央帝国的
时运、铁血与霸业

FORTUNE, WAR AND SUPREMACY
OF IMPERIAL POWER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历史的荣耀

中央帝国的时运
铁血与霸业

历史研习社 编著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的荣耀：中央帝国的时运、铁血与霸业 / 历史研习社编著. —
成都：天地出版社，2020.11
ISBN 978-7-5455-5883-8

I. ①历… II. ①历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古代史—通俗读物
IV. ①K2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0) 第145708号

LISHI DE RONGYAO: ZHONGYANG DIGUO DE SHIYUN、TIEXUE YU BAYE

历史的荣耀：中央帝国的时运、铁血与霸业

出品人 陈小雨 杨政
作者 历史研习社
责任编辑 王岚 贾启博
装帧设计 左左工作室
责任印制 董建臣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：610014)
(北京市方庄芳群园3区3号 邮政编码：100078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tg@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20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20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 12.5
插 页 16P
字 数 259千字
定 价 78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5883-8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：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：(010) 67693207 (营销中心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及时向我社营销中心调换

1

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非常喜欢历史的。

太史公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提到，自己著《史记》的目的是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太史公如此情怀——把历史作为探究天人关系的方法——不但成为后世中国史家的圭臬，也成为中国人对历史的独特看法。全世界从没有哪个文明，把历史看得如此重要。

于是，宋代司马光为宋神宗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为的是让皇帝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——王侯将相们希望通过历史来学习治国之道。而在民间，老百姓也对历史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和热爱，从古流传至今的诗歌、戏曲、评书、小说，都充斥着历史题材。这些民间文学借历史诉说着人们心中的英雄传奇，阐述着传统文化忠奸善恶的道德观念。

只不过，民间的历史文学习惯于将故事进行简单粗暴地处理，人物通通“脸谱化”，以至于人们对历史产生了一种刻板印象：“奸臣”祸国乱民，然后被“贤君”识破、被“忠臣”打败；勇

于创新的“改革家”和循规蹈矩的“顽固派”在为国家前途而争斗，好像前者就是天上派来拯救国家的，而后者就是以坑死国家为己任……

就像戏曲一样，小时候，我们看戏，长辈总是告诉我们：“看，坏蛋登场了，因为他是大白脸，所以肯定是坏人。”

把历史简单化的结果，就是有不少人认为，古代的帝王将相都是丑恶的：他们绞尽脑汁压迫百姓，百姓不堪忍受之时，怒吼一声，揭竿而起，“哐当”一下就推翻了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，然后周而复始，开始新一轮的循环。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轮回，有什么可说的？

但是，长大以后，我们才发现，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。“帝王将相”也好，“平民百姓”也罢，剥掉身份的标签，都只是些为功名利禄奔波的人。有些人在社会的顶层，有些人在社会的底层。帝王的枷锁不比普通百姓少，农民过日子打的小算盘不比官员差。

这些熙熙攘攘的各色人一起努力，构建了一套自己都数不清、道不明、理不顺的制度，在暗地里维持着社会的秩序，乃至推动着社会的发展。不要把历史上的伟人都想得特别聪明，看多了就明白了，大家都是在不断处理意外的过程中，“侥幸”推动历史发展的。

譬如，北宋神宗皇帝，他一直梦想自己能成为超越先皇的伟大帝王。为此，他与王安石一拍即合，强力推行新法。他的本意是要通过新法迅速富国强兵，开疆拓边，然而，新法的推行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恶果。尤其是青苗法，王安石一开始告诉宋神宗，这

个办法可以让朝廷增加税收，老百姓也不会增加负担，可谓两全其美。但是，当青苗法真的推行下去就逐渐变味了，地方官们为了完成王安石制定的考核指标，只得强行借贷给老百姓，再强行向老百姓催收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

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，并非宋仁宗的亲儿子。所以在宋神宗的心中，一直有通过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和父亲继承大统的合法性的冲动。能满足这种冲动的人，只有敢于大刀阔斧推行改革的王安石。王安石改革的措施是否合情合理，皇帝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去辨别。

在这段历史中，宋神宗想让老百姓得到实惠，结果却害苦了老百姓。王安石想通过理财手段为朝廷减轻财政负担，结果适得其反。司马光反对这种激进的改革方案，结果被贴上了“迂腐”的标签。

司马光可能没想到，自己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是为了让读者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，而他和王安石的争论，亦成为千百年后的历史，供人观读议论。他们到底谁对，谁错？这个问题，绝不是谁是“好人”、谁是“坏人”这样的问题能解决得了的。

无论是帝王还是将相，他们都是古代社会当之无愧的精英，是所处时代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不能简而论之，必须要设身处地地去思考他们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情境，揣摩他们行事的动机，然后再以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来评判他们个人，以及整个政治制度的优劣。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真正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，听懂他们的理想与抱负，理解他们的辛酸与折辱，会意他们的妥协

与退让。

如此，历史人物才不是纸面上冷冰冰的一个个名字，而是有血有肉曾经活过的人，他们也曾鲜衣怒马，也曾引吭高歌，也曾进退失措，也曾儿女情长。

以“鲜活”的历史人物为线索，才可以看清楚当时时代的面貌。

而历史研习社的作者们，就是想以历史学专业的严谨，结合优美的文字，新鲜的视角，带领大家穿越时空，鸟瞰古时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，朝堂之下的醉酒当歌。

2

历史研习社成立于2014年，是由一群来自香港中文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历史学硕士、博士、青年教师组成的历史学知识社群。我们希望让靠谱的历史学知识走出象牙塔，被更多对时间怀抱敬意、对人类的过去充满疑惑的人了解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今年，历史研习社的全网粉丝数已经突破50万，成为历史学新媒体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品牌之一。我们的文章也经常被海内外的媒体转载，受到很多专业人士的赞许。

顺时针研习历史，逆时针“解毒”世界——这是历史研习社的slogan。

怎样理解这句话？历史是时间，世界是空间，只有把时间和空

间结合起来研究，才能一窥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貌。之所以用“解毒”作为“解读”的谐音，是因为我们想破除一些流传在网络上的历史谣言，带读者走出一些历史误区。

当然，要做到这些，是古往今来数不清的历史学家共同努力的目标。我们势单力薄，只能以这个slogan作为自己创作的初心，勤勤恳恳，勉力为之，为大家奉上一份易读、耐读、悦读的精神盛饌。

《历史的荣耀：中央帝国的时运、铁血与霸业》是历史研习社出版的第一本书，我们将通过一个个闻名遐迩的帝王将相，来揭示他们如何在乱世中崛起，如何在崛起之后赢得民心，如何在登位之后巩固权力的基本盘，如何以超然的姿态分配权力，如何以强势的手腕推动改革，如何在国际事务上捍卫国家的权益……最后一点，他们中也会有失败者，那么他们失败的根源又是什么？

“鉴于往事”——我们追寻同《资治通鉴》一样的方法，但这次，目的不同了，历史不再服务于帝王将相，而是为大众品读，让大众从中获取知识，追思怀古，了解当下，乃至放眼未来。正如托马斯·潘恩曾所说：“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。”

本书不是讲帝王将相玩弄权术的操作手册，而是一部解析中国古代王朝权力博弈密码、洞察中央帝国持久运作底层逻辑的作品。毕竟，古代中国这种大一统的、早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帝国，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特例。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因此它的特殊性就值得我们去研究。如此，我们才能明白，中国历史为何会有自己独

特的发展脉络，中国人民为何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。

我们对于自己的文章，都是以写论文的严谨态度来创作，每一篇文章都要有详细的史料支撑，严密的逻辑架构。

我们要求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自己独特的思考，不能人云亦云，不能天马行空，更不能胡说戏说。我们对于杨贵妃如何洗澡，赵飞燕如何魅主没有兴趣，一个王朝的成败也决不能怪罪于几个女人。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，绝不擅自编造耸人听闻的历史段子。

我们力图以小见大，就像某些海外的历史学家能够从17世纪清代山东一个小村落的一件谋杀案看清代地方政府的运作，从苏州、常州的今文学派看明清两代的宗族关系和儒林演变等等。

同时，我们也力求文字的优美，就像黄仁宇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一样，去除掉佶屈聱牙的学究气，为读者带来无障碍阅读的体验。毕竟，我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，不是催眠药品。

3

历史研习社成立已经有六年，这六年里，我们宵衣旰食，笔耕不辍，未尝有一刻懈怠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粉丝们都在支持我们。下面随便列举几条读者的留言：

“历史故事写得如此幽默风趣，还怕历史没人喜欢吗？”

“好文章，点个广告支持一下。”

“写得非常好，政史地相结合！”

“这个时候看这篇文章，又是别样的滋味。”

“这就是学历史的好处吧，以史为镜，照尽世间丑恶。”

.....

读者的留言让人心潮澎湃，而持续不断输出高质量的内容，则是对粉丝们最好的回馈。研习社常常邀请众多历史学家参与某个话题的讨论，为读者提供大咖们的指导意见，帮助普通读者与象牙塔中的学者互动交流，比如，“历史学导师希望招收什么样的学生？”“历史学家心中最能培养历史感的电影是什么？”“成为学术大咖前他们在哪个行当谋生？”等等。

我们的粉丝里也卧虎藏龙，他们博学多闻，慧眼如炬，心细如发，文章中如果出现一丁点儿错误，都会被他们指出。这促使我们更加严谨地对待自己的文章，在准确性上精益求精。粉丝的期许，是我们不断写作的动力，粉丝的监督，是我们不断自检的压力，在此，研习社创作团队向50余万粉丝致以诚挚的感谢！

历史既然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构成的，那就不应该是冰冷枯燥的事件记录。英文中，“History”即“人类故事”之意。所以，书写历史，就应该把过去发生的故事优美地讲述出来，但同时也必须把这种故事本身具有的种种复杂性，以及它所具有的表面和背后的内容，忠实地呈现出来。能做到如此的深入浅出，是一个历史学人功力的体现，虽然我们还有不足，但我们一直心向往之。

太史公的教诲，让我们懂得敬畏历史。

读者的鼓励，让我们获得传播历史的动力。

这就是我们持续写作的原则。

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

谨为序。

历史研习社

2020年8月23日

“霸王道杂之”的统治艺术

任逸飞

汉家之道：汉代统治的思想内核

西汉王朝在经历了前期的“文景之治”和武帝开疆拓土的盛世后，在宣帝刘询统治时期（前74—前49年）迎来了第三段鼎盛时光，史称“宣帝中兴”。《汉书·宣帝纪》这样赞美宣帝一朝：

孝宣之治，信赏必罚、综核名实，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，至于技巧工匠器械，自元、成间鲜能及之，亦足以知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也。

宣帝能达到如此成就，按他自己的话说，是因为贯彻了“霸王

道杂之”的统治理念，而为此事他还与太子，也就是后来的元帝刘奭（前49—前33年在位）发生了一次有名的争论。《汉书·元帝纪》记载：

孝元皇帝，宣帝太子也……柔仁好儒。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，大臣杨惲、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，尝侍燕[宴]从容言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宣帝作色曰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何守，何足委任！”

宣帝认为“霸王道杂之”是汉代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，若是像太子说的那样纯用儒生施政，绝对要出乱子。然而，众所周知，自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以来，儒学地位扶摇直上，似乎早就应该成为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了，缘何宣帝与太子之间还会因此问题发生矛盾？宣帝所谓“霸王道杂之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？他又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一统治理念呢？

王霸与儒法：“霸王道杂之”的思想脉络

“霸王道杂之”，从字面理解即“融合王道与霸道”，那何谓“王道”，何谓“霸道”呢？“王道”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

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主张。孔子目睹东周以降，王室衰微、礼崩乐坏的局面，追怀过去古圣先王的治世，认为执政者只有遵循“王道”的政治理想，方能开辟太平。

“王道”必须建立在仁政之上，统治者要爱惜民力、复兴礼乐，恰如《论语》中所言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只用刑罚震慑百姓，而不以礼乐教化之，便谈不上孔子心目中的“王道”。

孔子的观点到战国时又得到孟子的发展。孟子将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明确加以区分，认为“霸道”确实能令国家强盛起来，却无法真正收服人心，只有“王道”才是实现统一、终结战乱的必由之路，所谓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，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”。孟子颇为理想化地认为，“王道”成功与否是不受国力强弱和国家大小左右的。

与“王道”相反，“霸道”恰恰将国家强盛视为至高法则。春秋时，齐桓公依靠管仲辅佐，使得国力蒸蒸日上，尊王攘夷、存邢救卫，最终成为“五霸”之首。如果说，“富国强兵”在春秋时还仅是诸侯国的可选项的话，那么，到了兼并战争愈趋残酷的战国时代，则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，当时以商鞅、韩非为代表的思想家，便将始于管仲的这套“富国强兵”之术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，形成了法家学派。

法家对儒家推崇的“王道”“仁政”嗤之以鼻。韩非认为：“今世皆曰‘尊主安国者，必以仁义智能’，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

仁义智能也。故有道之主，远仁义，去智能，服之以法。”制定严格的法令比空口谈仁义更有用，而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力量去消灭别人，否则便只能坐以待毙，正如韩非所言：“力多则人朝，力寡则朝于人，故明君务力。”

法家鼓吹的赤裸裸的“霸道”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成效，战国初期，商鞅在秦国开展“变法”，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，全面改革秦国的户籍、土地、税收制度，乃至计量单位、军功爵位和行政区划，把秦国打造成一台运转不休的战争机器。最终，在秦王嬴政的手上，这台机器横扫东方六国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——秦帝国。

可见，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围绕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已形成两种各有侧重的统治思路，“王道”主张仁政、德政、以民为本，儒家是主要鼓吹者；而“霸道”则主张力政、兵战、刑名法术，法家是主要鼓吹者。这两种统治思路对于秦汉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

秦以法家之“霸道”夺取天下，然而其统治仅经历两代就终结了，这给继之而起的汉代统治者以极大触动，反思秦亡的教训成了西汉初叶的一个重要命题。贾谊在著名的《过秦论》里指出，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“仁义不施”，“废王道而立私爱，禁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始”。秦始皇在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依然顽固地坚持法家的治国方针，以严刑峻法苛待百姓，无节制地动用民力，整个国家始终处于一种战时状态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，秦朝轰然土崩瓦解，就像一直紧绷的弦最终断裂一样。

贾谊已经意识到，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不可偏废，两者各有长处与短处，只有兼采而融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。对西汉早期的几任帝王而言，这番道理都是铭记于心的，高祖刘邦在刚击败项羽时，便受到陆贾语重心长的告诫：天下可于马上得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。至文、景二帝，长期实施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，厉行节俭。“文景之治”的理论依据是黄老之学，而有意思的是，黄老之学既与道家联系极为紧密，又与法家的“刑名之学”有诸多相通之处，可以说黄老之学是融合了道家与法家的一种思想，从这个角度考虑，文、景二帝崇尚的黄老思想可被视为“霸王道杂之”的萌芽形态。

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，在继承文景之治成果的基础上，为配合形势，有意识地对国家的统治方针进行调整，儒学开始取得重要地位：建元五年（前136年），置五经博士；元光元年（前134年），举贤良对策，采纳董仲舒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；元朔五年（前124年），兴太学，为五经博士置弟子，在弟子中选官，以经学之优劣为评判标准。至此，儒家思想在理论上成为王朝正统，而儒生参政的大门也由此敞开。

必须看到，武帝施政在本质上是王霸兼采的，他并非一边倒地信从儒者。武帝表面的“尊儒”，是因为董仲舒主张的“大一统”符合其强化君权与对外扩张的需要，然而一旦落到政治实践的层面，武帝更信用的却是张汤、赵禹等一班文法酷吏，而即便像公孙弘、董仲舒这样的儒者能获得武帝青睐，也是由于“通于世务，明于文法，以经术润饰吏事”——儒学抑或是“王道”，在武帝眼中

只不过起一个装点门面的作用。

武帝“阳儒阴法”的统治手段自然引发儒生群体的批评，汲黯便指责武帝：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”显然，宣帝所谓“汉家自有制度”的“霸王道杂之”是在其曾祖父武帝时真正成形的，那是否可以断言宣帝的统治理念完全承接自武帝呢？答案或许远非这么简单。

在武帝的阴影下：宣帝的政治抉择

要真正理解汉宣帝的施政方略，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：一个是他即位时西汉面临的内外局势，另一个则是他本人的成长经历。

武帝一朝，锐意“开边”，北击匈奴、通西域、开西南夷，汉帝国的势力膨胀至极点。然而长期的对外战事，严重损耗了西汉的财力和民力，武帝的应对之道却是越发倚重酷吏，在大肆搜刮民间财富的同时，镇压社会上的反对力量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记载，当时酷吏制定的死刑条目已经繁多到骇人的地步：“禁罔浸密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，大辟四百九条，千八百八十二事，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。”

武帝的穷兵黩武和严刑峻法，至其统治末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批判道：“孝武穷奢极欲，繁刑重敛，内侈宫室，外事四夷，信惑神怪，巡游无度，使百姓疲敝，起为盗贼，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。”在司马光看来，汉武帝的